



新经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[美]露西亚·伯林著
王爱燕译
《欢迎回家》

乡关何处

□李北园

岁月不居，又是年末。这一年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回家过年是正经。家是举杯欢庆的地方，也是黯然神伤时疗愈的地方，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归属，无论心灵还是身体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家，无一不是在写“家”的故事。美国传奇女作家露西亚·伯林（1936—2004）有本散文集，就直接以“家”命名，中译本的名字叫作《欢迎回家》，英文版原名则是 Welcome Home。

露西亚·伯林1936年出生于阿拉斯加，在美国西部的采矿营地度过了幼年时期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她的父亲参军出征，她随母亲迁居到外婆家，再之后又南迁，移居到智利。成年后，露西亚又先后在墨西哥，美国的亚利桑那、新墨西哥、纽约居住过，据她的儿子回忆，他小时候大约每九个月就会搬一次家。不稳定的生活在露西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上有所投射，她有三次失败的婚姻，独自抚养四个儿子长大。为了养家，她从事过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职业，从电话接线员、清洁女工到病房管理员、急诊室护士，再到中学西班牙语教师、监狱写作教师等等。露西亚身上具备一种能够打通这些职业的能力，那种能力叫写作。

在为日常生活所累的同时，露西亚一辈子都在奋笔疾书，写出自己和他人的故事。露西亚的二儿子杰夫·伯林回忆幼时情景，“我和哥哥马克在格林威治村的阁楼上骑着小三轮车转圈，母亲则在她那台奥林匹亚打字机上不停地敲打着”。在随后的七八年里，露西亚又生了两个孩子，并且和第三任丈夫离婚。在杰夫·伯林的记忆中，那时候的生活一团糟，但母亲露西亚却写得比以往更多。每次看完喜爱的电视节目，露西亚就会坐在厨房的餐桌旁，手边放一杯波旁威士忌，开始写作，经常一直写到深夜。

写作拯救了露西亚，她一生中发表76篇短篇小说。这位勤劳的作家生前就已经在文学团体中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力，但可惜并未得到大众读者的关注。露西亚逝世11年后，短篇集《清洁女工手册》出版，其中收录了43篇短篇小说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生活场景。同为短篇小说家的莉迪亚·戴维斯为这部集子撰写了前言，她说：“我一直有种信念：最好的作家就像奶油，迟早有一天会浮到最上层，获得他们应得的认可——他们的作品会被谈论、引用，走进课堂，搬上舞台，拍成电影，谱上曲子，选入文集。也许，有了眼下这本选集，露西亚·伯林会开始得到她应得的关注。”的确，《清洁女工手册》带露西亚进入大众视野，将迟到的尊敬和喜爱郑重交付。

露西亚的写作内容大多来源于个人的真实生活，如果说《清洁女工手册》还被伪装成以“家”为圆心而向外延展的小说，那么《欢迎回家》则是确凿无疑的写实作品了。《欢迎回家》收入了露西亚·伯林关于“家”的回忆录、与亲友的往来信件和七十余张照片，循着里面细碎闪亮的光泽，作家最真实、细腻、迷人的内心世界被看见。

大半生居无定所的露西亚，在二十九岁之前，就已经辗转三个国家、十八个地方、几十处住所，尽管灾难不断、麻烦频出，但这些住所承载过她的幸福与温柔、眼泪与坚强，于是她将所有住所——包括一辆大众面包车——都称为“家”。2003年，就在去世前一年，露西亚接受了一次访谈，谈到家，她说：“说来可笑，我在那么多地方生活过……由于频繁搬家，住处对我来说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也一直在寻找……寻找一个家。”

露西亚写自己婴儿时期在阿拉斯加的家：“他们说那是一栋温馨的小房子，有许多窗户和几个敦实的柴炉，纱窗紧闭，以抵挡蚊虫。房子面朝海湾，看得见落日、繁星和耀眼的北极光。妈妈轻轻摇晃着我，凝望着下面的港口……”她写在墨西哥住过的帕拉帕，那是一种用棕榈叶做屋顶、用木材支撑的开放式房屋：“这所屋子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古老渡船般的威严，因此得名‘梦幻之船’。棚内凉爽宜人，棚顶宽阔，用高高的硬木房柱支撑，横梁用木薯藤捆扎固定。这所房舍就像一座大讲堂，尤其在夜晚，透过棚屋连接处如同天窗般的缝隙，星星月亮在夜空中幽幽地闪着光。”她写在外婆家和家人的团聚：“那次团聚是在圣诞节，除了一屋子挤进三十个人，还发生了些其他事。首先，家里所有人都盼着舅妈死掉。她和舅舅一直非常幸福，他们相亲相爱，身体健康，但后来她得了场大病，十分痛苦，无时无刻不感到疼痛。”

乡关何处？在露西亚的文字里，有亲人的地方就是“家”，情感寄托的所在就是家。她坦诚、克制地书写着生命里的美好与痛苦，在漂泊之中从未放弃寻找“家”。她的每一个读者都能在露西亚的文字里，观察到属于自己的“家”。



朱自清著 萧桓 注释 刘勃 解说
《经典常谈》（注释解说本）
新星出版社

关乎人文

□陆远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曾对他所处的时代充满焦虑，因为“过去的遗产被认为是讨厌的累赘，人们避之唯恐不及”，不过希尔斯坚信这种肤浅的社会潮流终究会得到纠正，在著作《论传统》中他表示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尽管充满了变化，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、持久的制度之中，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”。几乎同时，中国教育家叶圣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：“历史不能割断，文化遗产跟当今各条战线上的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牵连，所以谁都一样，能够跟经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”。叶先生的这番话，是为了表彰一位亡友在传承与普及文化经典方面作出贡献：朱自清先生与他撰写的《经典常谈》。

《经典常谈》分十三篇，概括性地介绍了中国传统典籍“经史子集”各部代表性作品，是朱先生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，揭橥作品背后的人文意涵，数十年来滋养了几代中国读书人，去年又入选部编初中语文教材推荐必读书目，老树新花，再一次受到读书界和教育界瞩目。如果把《经典常谈》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解读，就会发现，品读这本薄薄的小书，其实更有几番深意值得发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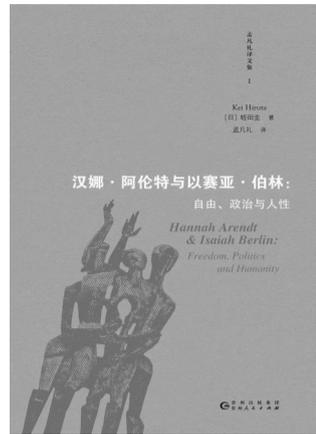
如何对待传统经典，是“新文化运动”以来中国知识界聚讼纷纭的核心问题之一，围绕在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等刊物周围的“新派”知识分子，掀起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大旗，大多对传统文化秉持否定态度。批评态度激烈者如鲁迅先生，直到1925年还主张“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”，钱玄同更是认定汉字“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”。朱自清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，1920年加入新潮社，属于不折不扣的“新文化”阵营。在现代文学史上，他主要也是新诗和散文闻名，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》都是白话名篇。不过朱先生内心的自我期许，与他的外在形象，多少还是有些差异，他曾说过，“国学是我的职业，文学是我的娱乐”，在清华教书20余年，他所开课程也大多围绕中国古典文学展开。可以说，中国古典文化的世界，是许多像朱自清这样“一新一旧”的一代知识人毕生志业所在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“五四”新人到了三四十年代要倡导“重读经典”了。

朱先生倡导常谈经典，并不仅仅出于提升国民语文素养的考量，他再三呼吁“古典的训练”是“中等以上有相当教育的国民”应尽的义务，不是为了“教学生练习文言的写作”，而是试图通过古书古文的阅读，“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”，“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”。《经典常谈》的写作时间是1938年至1942年，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。在这样的艰难时世，不失去对本民族的信心是“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”应有的精神底线。用作家刘勃的话说，国难当头，朱自清花大力气写一本“不在实用”的著作，“正包含着一种凝聚民族信念、一致抵御外侮的深切用心”。烽火连三月之际，读经典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对本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认同。“价值认同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，但是有了价值认同，群体内部才能有效协作，才不至于为了一点眼前的利害，争得头破血流或者拆家散伙。这是经典训练的‘无用之大勇’。”

经典固然重要，但经典教育却并非易事，在这方面，朱自清先生以博采众长的学术视野，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和切实浅明的语言风格，使《经典常谈》成为传统文化基本训练当之无愧的典范。他想以这本小书为媒介，将自己青年时代接受经典教育的成功经验“金针度人”，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代读者。平易近人的“常谈”蕴含着他对教育的思考。正因为如此，叶圣陶说，“现在正在编撰百科全书，朱先生这本书里的十三篇可以作为十三个条目收到百科全书里去”，吴小如也说这本书里朱先生最得心应手的那些篇章（比如谈“诗”和“文”的两部分），“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，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”。

《经典常谈》首次出版是在1942年，至今已超过80年。朱先生自己也说，“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”，80多年来信息更迭日新月异，读者的知识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，许多当年的“文化常识”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很陌生，不少当年公认的学术观点今天也在被重新审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本身已成为“经典”的《经典常谈》，也有了被“常谈”的必要。学者萧桓提纲挈领，对书中的知识点进行了详细注释，作家刘勃阐幽发微，对每一篇章进行了适度解说，与朱先生的文章合璧为这部注释解说本《经典常谈》，读一部书等于三次浸润经典，真是我辈读者的福分。

我思我在



Kei Hironaka
[日]蛭田圭著 孟凡礼译
《汉娜·阿伦特与以赛亚·伯林》
自由、政治与人性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好看的学术八卦

□思郁

最早得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·伯林非常不喜欢美国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的时候，我还是挺意外的。在我的阅读谱系里，这两位思想家的影响力不分伯仲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都滋养了我不同成长时期的思想启蒙。只不过，我早年更喜欢伯林，对他的消极自由和多元价值的理论非常推崇，现在我喜欢阿伦特更多。阿伦特是个思想的宝库，跟当下有着神秘的关联，尤其是她后期关于思考、责任与判断的文章，都可以适用当下这个甚嚣尘上的语境。而伯林的思想慢慢隐晦不显了。

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非常大。在《伯林谈话录》中，他还是比较克制地表达了对阿伦特著作的批评，说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关于俄国的部分全都是错的，《人的境况》是一堆自由的形而上学的联想，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是荒谬的，这还算是学术批评。此后随着阿伦特的辞世，这种敌意并未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，他甚至形容阿伦特“对我来说一个真正的眼中钉——无论是活着，还是在她死后”，还说“她真的是我厌恶的东西”。

但是从事实上看，伯林对阿伦特的厌恶毫无缘由，他们的一生没打过几次照面，而且基本也没有任何深入的交流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对伯林非常情绪化的言辞，阿伦特大概也有所耳闻，但基本没有什么回应，她对阿伦特的评价就是，伯林甚至都不算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。而且从他们一生留下书籍看，阿伦特几乎不读伯林的书籍，伯林虽然讨厌阿伦特，但是却一直都在读她的书，然后读完就狠狠批判。所以，这种敌意和厌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日本学者蛭田圭据此写了一本书叫《汉娜·阿伦特与以赛亚·伯林》，这大概是今年最好看的一本学术八卦书了。从伯林对阿伦特的厌恶入手，分析了他们不同的成长和思想形塑的生涯，分析精准，学术的评价也到位，关键写作也没有学究气，非常好看，可以为了了解他们两人思想的入门书。中文的翻译也很加分。是2024年学术书的一本翻译佳作了。

其实从他们互相的经历看，两人的相似之处更多，比如基本是同代人，都是犹太人，阿伦特出生于1906年，父母都是完全归化的中产阶级；伯林出生于1909年一个富裕的说俄语的犹太家庭。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后，全家移居到英国伦敦，伯林进入到牛津大学，二十二岁就成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。他的学术生涯非常稳定，基本没什么波折，二战还作为英国的情报分析专家参与到决策层，认识很多大人物。战争结束后，继续回到大学教书写作。

阿伦特前半生的生活比他惨多了，纳粹上台后，全家开始逃亡到法国，差点被送入集中营，而后辗转多难，1941年才到了美国，重新学英语，找工作，努力进入学术圈，逐渐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。总之，这两人之间，看起来相似性有，但是总归学术道路是不同的。

蛭田圭在书中着重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，比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，阿伦特师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，伯林更信奉英国的经验主义，这两种传统互相看不顺眼。还有他们对自由的认知有差异。后期最大的争议点就是阿伦特在《纽约客》上连载了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之后，伯林对阿伦特的批评。

在蛭田圭的书中提到了他们两人之间互相的一个评价，这个评价来自跟阿伦特与伯林同时交往，也曾帮助他们牵线搭桥，想让他们互相理解的阿瑟·小施莱辛格。小施莱辛格认为，对伯林来说，阿伦特太严肃，太自命清高，太黑格尔化了；而对阿伦特来说，伯林太轻浮，又不够严肃。所以他们短暂地会面之后也留下了不佳的印象。这次见面是不是意味着加深了各自的偏见呢？那到底为什么伯林始终对阿伦特充满这么大的恶意呢？这里面是否存在一种性别主义的偏见？阿伦特的好斗属性，或者在一个男性为主的世界里，偏偏表现出来更多的男性气概，这种故意为之的傲慢，是否也激发了伯林更多的反感？这些我们都无法得知。

蛭田圭在书的结论部分中，也并未特意将两人强行和解，他只是分别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仰，毕竟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他们性格不同，学术志趣也相异，但都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扬名寰宇。他尊敬他们都践行了苏格拉底的名言，真正的哲学根植于激情的知行合一。

远见近拾